

# 為慈禧立傳的兩枝曲筆

● 梁元生

Sterling Seagrave: *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ff, 1992).

晚清宮廷的鬥爭、紫禁城內的生活，以及末代皇帝的故事，不但在中國人社會中為人樂道，在西方世界也有不少的聽眾和讀者。

在愛新覺羅王朝的最後數十年中，最有影響力而又最具傳奇性的政治人物，當然要首推西太后慈禧了。她從同治朝開始垂簾聽政、參與國事，中間經歷自強運動、中法戰爭、甲午之役、百日維新、庚子之變，以及二十世紀初此伏彼起、接續而來的革命運動。她不單身歷此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而且與每件大事都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是晚清政治和近代歷史中一個關鍵性人物。研究清史的學者，許多皆涉及慈禧的角色，關於慈禧的生平事迹，除了一些零散的論文外，還沒有一部嚴肅的史傳。坊間流傳的多

數是野史和掌故式的傳記，最普遍的《慈禧外傳》及《御香縹緲錄》，竟又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德齡郡主所著的版本。

反觀英文的慈禧傳，則有好幾本之多。最有權威性而又差不多最早期出版的有濮蘭德 (J.O.P. Bland) 和白克侯斯 (Edmund T. Backhouse) 合著的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1910)，另外，兩人還合著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1914)，也是以慈禧為主角的。此外，二十世紀初期出版的英文慈禧傳，還有沙晉德 (Philip Sergeant) 著的 *The Great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以及德齡郡主的兩本傳記，一部為 *Imperial Incense*，《申報》譯為《御香縹緲錄》，後秦瘦鷗譯為《慈禧外傳》，另一部為 *The Old Buddha* (老佛爺)，皆20年代時之作品。近數十年來西方對慈禧太后之興趣並未稍減，先後出版的有柯里士 (Maurice



在愛新覺羅王朝的最後數十年中，最有影響力而又最具傳奇性的政治人物，當然要首推西太后慈禧。

Collis) 之 *New Sources for the Life of Empress Tz'u-hsi* (慈禧太后生平研究之新史料) 和瓦納 (Marina Warner) 著的 *The Dragon Empress: Life and Times of Tz'u-hsi, 1835-1908* (慈禧太后的生平與時代)。學術研究也有幾篇以慈禧為重點的，如鍾素芳 (Sue Fawn Chung) 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撰寫的博士論文，但未出版成書。有關慈禧的最新著作，是本文要評述的 *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著者施格里夫 (Sterling Seagrave)，亦即是 *The Soong Dynasty* (宋氏王朝) 及 *The Marcos Dynasty* (馬可仕王朝) 兩書的作者。

施格里夫在這本慈禧新傳中，

要為西太后作歷史翻案，把前人對慈禧的批評加以駁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拆穿那些偽造歷史者為慈禧塑造的假面，重新使到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慈禧呈現於讀者眼前。

施格里夫認為，慈禧之所以被描繪成為一個工於心計、巧弄權術、穢亂宮闈、任用小人，而又凶殘狠毒和可怕猙獰的人物，完全是由於政敵 (尤其是康梁黨人) 的詆譏，和「假漢學家」白克候斯的曲筆。在他看來，中國學者及海外華人多數皆受了康有為、梁啟超和林文慶等人的影響，而在西方，幾乎所有的人皆受到了白克候斯的矇騙，包括了與白克候斯合著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的作者

施格里夫認為，慈禧之所以被描繪成為一個工於心計、巧弄權術、穢亂宮闈、任用小人，而又凶殘狠毒和可怕猙獰的人物，完全是由於政敵的詆譏，和「假漢學家」白克候斯的曲筆。

在施格里夫筆下的白克侯斯，不單是個學術騙子，欺世盜名之外，還真的會趁火打劫，乘着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時，大事搜刮珍貴的典籍和史料，然後儼然以文物收藏家和漢學家自居。

濮蘭德。施氏認為，濮、白二氏合著的慈禧傳，裏面有許多是白克侯斯閉門造車、胡亂杜撰的成分，沒有真正的歷史價值。他又說濮蘭德只是個潤色英文和負責聯絡出版的人，因為濮蘭德文筆洗鍊、語多工整，而且是《倫敦時報》在華的特派員，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和出版經驗，所以白氏邀為合著人，但書中的史料和意見都是白氏所提供的。

施格里夫的慈禧傳，主要是針對白克侯斯一書。他對濮、白二人的傳記提出了極其尖刻的批評，否定其對慈禧家世、生活和人格所有方面的看法。不但如此，他更認為白克侯斯如此描繪慈禧及偽造史料，還有私底下自私的動機和性格上的缺點。他以為這個在中國生活了近半個世紀的著名漢學家，是個非常聰明但又極不負責的「騙子」，他有着不錯的語言能力，而且懂得裝模作樣，弄出許許多多的假史料作為證據（例如《景善日記》），叫人真假莫辨，而他自己則名利雙收，既獲歷史家和漢學家的令譽，又從



所謂「修正史學」的代表，未必就真的能還史實的本來面目，反倒可能愈描愈糟。

買賣真假古書及史料中謀取厚利。在施格里夫筆下的白克侯斯，不單是個學術騙子，欺世盜名之外，還真的會趁火打劫，乘着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時，大事搜刮珍貴的典籍和史料，然後儼然以文物收藏家和漢學家自居。

其實，關於白克侯斯偽造史料的這一點，在英國史家 Hugh Trevor-Roper 所著的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北京的隱士：白克侯斯爵士生平揭秘》1976）書中，已有相當詳細的揭露和描述，施格里夫的意見並非驚人的發現。至於白氏偽造《景善日記》一事，早有毛以亨等人提出質疑，最近又有駱惠敏(Hui-min Lo)作出詳細的分析和總結（見澳洲出版的 *East Asian History*, vol. 1 (June, 1991), pp. 99-124）。換言之，施格里夫在這本慈禧新傳中有意無意之間把自己的意見標榜為開山鑿空、獨立於群之論，是對其他學者不公的做法。不過，施格里夫對白克侯斯的批評之刻薄，則過於 Trevor-Roper 及上述諸家。他用了很多的篇幅，醜詆白氏的人格，其中涉及白氏的私生活與同性戀行為，極盡刻薄挖苦之能事，頗有打落水狗之勢。白克侯斯著史所用的曲筆，當然不值得我們效法，但施格里夫竭力邀功的態度，也不是持平的做法。白氏在世期間，過着一個退隱式的生活，對於時人的許多批評很少反駁，以「忍」的態度處之，並且為自己寓廬取名「百忍堂巴念茲」（巴念茲是 Backhouse 自取的中譯名）。白氏之忍，可能是明知理虧的懦怯，但

如果他看到施氏尖刻涼薄的批評（「騙子」、「畸型的同性戀者」、「春宮迷」、「黃色作家」等等），大概也會在墳墓中睡不安寢（turn his body in the grave），正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施格里夫除了批評白克侯斯之外，還對維新派的健將多所指責，認為他們造謠生事，醜化慈禧。他把康有為描寫為狡猾的「野狐」，而梁啟超則是無的放矢的「毒筆」；再加上林文慶等人在海外的宣傳，慈禧乃變成了一個專權、小器、凶殘和醜惡的「妖婦」。他說許多中外學者皆受康梁和白克侯斯的蒙蔽，不能辨明真偽。連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出版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籍，也都歸入他所說的「不能分辨慈安與慈禧」（甚至不知道有慈安）的「所謂史家」之列。他這種輕視學者的態度，和以為許多治中國近代史者不能分辨東西兩宮，而且把滿清皇室的許多妃嬪混淆的說法，是相當武斷和有欠公平的，因為他對戴逸、莊練、清史研究及滿學研究會諸人的著作，不但沒有提及，很可能亦一無所知，卻作此驚人之語。再者，他自己時常用來佐證的一本參考書——鄭兆江著的*The Mosaic of Hundred Days*（百日維新研究），就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出版的東亞研究系列叢書之一！

施格里夫自以為這本慈禧新傳乃是「修正史學」的代表。從懷疑歷史和批判前人的精神此角度看來，本書也有其可取之處。但施氏能「拆」不能「立」，在“deconstruct”（拆）上下了不少功夫，但在重建慈禧的歷史形象上則成就不大。換言

之，他的書使人了解到濮蘭德及白克侯斯所著的慈禧傳為不足信或不可信，但明眼的讀者及一般的史家也都不見得會相信他筆下的慈禧——一個在權力鬥爭和派系衝突之中受害的女人。

施格里夫除了批評白克侯斯偽造史料和杜撰史實之外，又指責他誇張傳說和取媚讀者。其實，這些批評也可以用在施氏所寫的傳記上，在他寫到慈禧選秀女，由宮廷人員檢驗童身時，他不厭其詳地引用了Frank Dorn醫生的記述，說十六歲的慈禧如何在脫衣檢驗之時，把玉鐲子塞到檢查的婦人手裏，以偷天換日手法，騙過了宮廷的查驗。此外，施氏又用了很長的篇幅去描寫咸豐和同治皇帝的性生活，包括冶游、春宮、性變態諸畸形，且引錄道家教人「陰陽和合」及「一夜御十女」的秘方妙訣；還有對宮中太監的「半人非人」(semi-man)的生活也有誇張的描繪。這些明顯地是在吸引一般西方的讀者，以收行銷之果效。他把白克侯斯說成一個「狡猾的黃色作家」(sly pornographer)，而他自己也正是一個這樣的人。

白克侯斯和施格里夫這兩位慈禧傳記的作者，相差八十年，文字皆洗鍊，但使用的同是一枝曲筆。

**梁元生** 1980年獲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加州州立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

施格里夫自以為這本慈禧新傳乃是「修正史學」的代表。從懷疑歷史和批判前人的精神此角度看來，本書也有其可取之處。但施氏能「拆」不能「立」，在重建慈禧的歷史形象上則成就不大。